

自由主義的「復興基地」：保守政治家 沈昌煥的最後見證

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・石之瑜

提要

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一體的兩面，相互構成並互為因果，則以保守主義為一種改革深化的手段，便不是脫離常軌的想法。在臺灣，政治與知識菁英睥睨保守主義，一旦保守主義式微之後，久而久之甚至不存在真實的，或不為既得利益進行掩護的誠懇的改革者，這時再也不能憑空設想出一套保守主義價值。本文的目的就是發現保守主義的餘燼，復燃之，以激發改革與自由的生機。沈昌煥可以說是臺灣最執著、最有系統的保守政治論述家，他的論述可以用「復興基地」四個字來總括，他即使不是最後一位採用這四個字來定位臺灣的政治高層人物，起碼是統治菁英中，最後一位依照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，認真發展一套觀察、評估、論證時事與政策的保守角度者。從他的政策論述中，某種可敬的保守主義風範透露出來，自從沈昌煥退出政壇，復興基地論述就快速式微，而改革者與自由主義空洞化也蔚成趨潮。本文從沈昌煥自黨政退休前最後幾年的政策論述中，來重現臺灣曾有過的某種保守主義政治內涵。

【關鍵詞】自由主義 保守主義 沈昌煥 國家定位

一・臺灣保守主義的餘燼

從蔣經國開始推動臺灣化，經過李登輝的提倡而為本土化，再到陳水扁轉進成去中國化，似乎改革成了臺灣統治文化中最重要口號。¹同樣在學術界，對改革與

¹ 包括教育、司法、國會、金融、行政、稅制、社會、心靈、憲法、政府體制等等都要改革。



民國73年6月5日，沈昌煥先生（左二）宣誓就任總統府秘書長，右為汪道淵先生。

變遷的研究佔據了文獻中極大的比重，從經濟與社會的自由化，到政治與法律的民主化，處處洋溢著除舊佈新的氣息。²關於過程的研究比關於目的的研究更吸引人，因為過程是變動的，帶來不斷解放的進步意識，而目的是靜態的，將人鎖在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使命之中，可以說，近三十年的臺灣是個改革年代。

然而從事改革的政治人物，與宣揚自由主義的知識菁英正面臨一個論述上的困境，那就是不論在什麼時間或什麼地方，當前只存在以改革自許者，沒有針對所謂改革加以檢討反省的保守論述，以致於政壇上的對立，引發改革者之間出現真偽之辯，相互指摘政治上的敵對派系為虛假的改革者，充其量他們只是打著改革口號的

² 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也產生極大影響，例見黃德福，《民主進步黨與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》（臺北：時英出版社，民國81年）；石齊平，《臺灣經驗的過去，現在與未來》（臺北市：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，民國86年）；陳文俊，《政治社會化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 大(專)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之研究》（高雄市：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，民國86年）；張忠棟、李永熾、林正弘（合編），《什麼是自由主義》（臺北市：唐山出版社，民國88年）；呂亞力，《政治自由化及民主化發展》（臺北：二十一世紀基金會，民國79年）。

既得利益者。知識界主張保守主義的聲音早就渺不可聞，只剩下不同的自由主義流派相互糾結。³的確，不論政治改革或自由主義都可能是為既得利益在掩護，但只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的人，沒有資格可以稱為保守主義，所以也不應被改革者當成可敬的對手。

在缺乏可敬的對手的情況下，改革者的怠惰也就不足為奇了。至於自由主義變得空泛，對改革者缺乏警惕或引導作用，⁴也多少是肇因於保守主義的式微，導致以改革為主導的政治論述沒有政治對手，統治階層不在乎自由主義者的批判，甚至在觀念與心態上，還覺得親近自由主義者。簡言之，自由主義對於沒有保守主義為思想指導的假改革，不具備批判的能力。對於藉改革之名造成的虛無與混亂，必須仰賴保守主義的重建來匡正，即藉由某種目的為導向的理想境界，來質疑以過程為導向的自由化進程。而自由主義的再生，也可以在保守主義重建的基礎上，藉由可敬對手的出現，來維護過程導向的變遷與進步意識。⁵

其實，過去在挑戰保守政治的歷程中，自由主義也有其目的導向，質言之，就是人的解放，同理，今日要重建保守主義的努力，也有過程上的重大意義，亦即在對失焦的改革，啟動再改革的過程。⁶不論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都很難定義，廣義地來說，本文所指保守思維的特點就在於，要求統治者在情感上與知識上認真體會一套道德價值的意義

改革者的無情無理，就淪為自利。意義，用祭神如神在的精神去奉行；相對於此是自由主義的特點，即在於同情生活世界中已然脫離固有價值的人們的需要，不受拘泥地開展足以適應變遷的論述。⁷沒有保守主義政治家與思想家的統治文化裡，也就沒有自由主義仰賴的同情心與同理心。改革者的無情無理，就淪為自利。

既然保守主義與自主主義是一體的兩面，相互構成並互為因果，則以保守主義為

³ 事實上，在臺灣知識界，研究與提倡自由主義的作品與作者多如牛毛，但提倡保守主義的鳳毛麟角，至於關於保守主義在臺灣的研究幾乎不存在。知名學者如錢永祥、瞿海源、顧忠華、江宜樺、林火旺、張忠棟、蔡英文、張福建有關自由主義之著述甚夥。

⁴ 參閱林毓生，《臺灣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？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省察與前瞻》（臺北：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，年代闕）。

⁵ 參考Arthur Schlesinger, *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* (Boston: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, 1986)。

⁶ 可參考余英時，《挑戰與再生》（臺北：幼獅書局，民國74年）。

⁷ 參考陳毓鈞，《保守主義與美國政治》（臺北市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民國78年）。

一種改革深化的手段，便不是脫離常軌的想法。自由主義者不可能消滅保守主義，就如同保守主義不可能消滅自由主義。今日假改革者充斥的相互指控如果屬實，剛好說明在地統治文化中自始沒有深厚的自由主義，所以保守主義也難以存活，於是進而制約了自由主義的深化與普及。

但是，在臺灣要重建可敬的保守主義論述談何容易，這不僅是因為近十餘年來，政治與知識菁英睨視保守主義，就算是有心人知覺到自由主義喪失批判力，對於真假改革不能有效辨別，久而久之甚至不存在真實的，或不為既得利益進行掩護的誠懇的改革者，也不能憑空設想出一套保守主義價值。本文的目的就是發現保守主義的餘燼，復燃之，以激發改革與自由的生機。

一般回溯自由主義在臺灣的進程，是由胡適、殷海光以降，以迄胡佛、楊國樞。在政治上，自由主義與自由派的鬆散稱呼並無嚴格區分。至於保守主義，似乎止於清末的嚴復，⁸並未深植於臺灣，可是在政治上的保守派卻比比皆是，包括兩位蔣總統在內。蔣經國因其晚年作風開明，又更接近實際的生活世界。不過，兩蔣時代不墜，又跨越李登輝時代的沈昌煥，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保守政治家。他雖然不必加入到保守主義思想家的陣營中，但所主張的政策思維則非常符合前述保守主義的範疇。

沈昌煥可以說是臺灣最執著、最有系統的保守政治論述家，他的論述可以用「復興基地」四個字來總括，他即使不是最後一位採用這四個字來定位臺灣的政治高層人物，起碼是統治菁英中，最後一位依照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，認真發展一套觀察、評估、論證時事與政策的保守角度者。從他的政策論述中，某種可敬的保守主義風範透露出來，而他正好是李登輝以降的改革者最先鎖定攻擊的對象。自從沈昌煥退出政壇，復興基地論述就快速式微，而改革者與自由主義墜落或空洞化也蔚成趨潮。本文以下從沈昌煥自黨政退休前最後幾年的政策論述中，來重現臺灣曾有過的某種保守主義政治內涵。

二、沈昌煥的敘事基礎

沈昌煥在蔣經國過世之後，續任李登輝之總統府秘書長，後因質疑黨的蘇聯政

⁸ 參見黃克武，《自由的所以然：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與批判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，民國87年）。

策辭職獲准，但仍續任國民黨中常委至十四大之後退休。沈昌煥是在國民黨本土化時期最常以「復興基地」來比喻臺澎金馬，在他之後，復興基地在檔文中出現的比例大幅降低。⁹沈昌煥之使用復興基地，有其一套前後相連貫的論述，與黨內其他人士如李登輝、李煥、倪文亞、郝柏村、蔣仲苓、許水德、許歷農等人使用復興基地一詞時相比，沈昌煥的論述具備一個完整的世界觀，因而在不同的事件或政策上，能夠對當時已經成為主流的改革論述，提出一套充分而且有系統的對話與批判力量。作為保守政治辯論家，他不同於其他統治階層保守派流於人事立場或利害之爭，或即興散漫之談，故推為臺灣政壇最後一位保守政治家。以下先歸納沈昌煥常年所堅持的三項基本立場，包括漢賊不兩立、尊蔣與民主化等三方面，下一節再整理依據此三項基本立場所延伸的政策立場。

（一）漢賊不兩立

作為復興基地，中華民國政府的最後任務是反攻大陸，這個出發點在主張改革的各派眼中，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最後一次在這個問題上的公開論戰是蔡同榮對蔣仲苓，後者在答詢是否復興的意思是反攻大陸時，則澄清說，「不是反攻大陸，我們的政策是和平統一」，故復興所指，指「復興中華民國、復興中華民族」，於是引起蔡同榮追問，「中華民國不是好好的嗎？」，「中華民國很健康嘛！」，難道「是中華民族已經被消滅了？」他的質詢是在表達政府不應該「把臺灣當工具」去反攻大陸。¹⁰反攻大陸一旦不是政府的目標，則復興基地就無所謂復興了。

一般常見對復興基地定位的批評，是以外交上缺乏彈性為對象，沈昌煥本人主持外交數十年，最反對彈性外交，造成各界認定他是我國外交關係不能突破的關鍵。彈性外交最具體的表現，就在於對外國同時與北京及臺北維持外交關係，是否應該或能夠坦然處之的問題上。沈昌煥站在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上，自然持堅決反對的態度，過去他甚至因為外蒙加入聯合國時我國未投反對票而請辭，¹¹以致於他在民

⁹ 將民國81年8月沈昌煥在國民黨十四全大會退職之前兩年，與之後兩年相比，復興基地在「聯合知識庫」出現的年平均率，從80次降到15次，稍早在李總統正式獲國民大會選為總統之前，出現年均率約190次。

¹⁰ 盧德允，〈中華民族已經被消滅了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4年4月11日）：2。

¹¹ 石之瑜，《政治文化與政治人格》（臺北：揚智出版社，民國91年），頁101-103。

國77年離職總統府之時，立刻有人傳出訊息給新聞界，謂外交部與總統府「心態已有極大改變」，可以重拾「當年錯失了的時機」，恢復外交作為一種「藝術」。¹²

雖然李總統就職之後，沈昌煥很少再用到漢賊不兩立的字眼，但復興基地的概念幾乎可說是同義詞，所謂漢賊論述就是復興論述。沈昌煥本人的看法當然不僅止於所謂漢賊不兩立，更重要的是王業不偏安，因為心存偏安即無王業可言，國家也將隨之瓦解。依照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，漢賊不兩立不只是外交政策的一種藝術運用，而是一項國策，亦即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基礎，因此構成保守思想中最精深的一個哲理。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至臺澎金馬，是在內戰中為中國共產黨所趁，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的唯一正當理由，就是反攻大陸，因此所有的政策必須對這個當前的立國目標，緊密配合，稍有疏失，就會遭受到國內、外的質疑，從而使國家失去奮鬥的目標，如此政府將無法領導人民，人民也將心向大陸，中華民國不待中共前來，自己就已經滅亡了。

同樣重要的是，中共為了完成自己對中國的完整統治，必須要消滅中華民國，統一臺灣。故並不是臺灣自己片面決定不要反攻大陸，就可以改變中共對中國統一的态度。而若復興基地的政府放棄反攻大陸，其結果反而將使中共有了更靈活的手段來吸引臺灣民心，因為政府自己不把中共當十惡不赦的敵人，百姓當然不會有心防，於是就替中共推動統戰開闢了無限的寬廣空間。

準此，反攻大陸的實力不是問題的重點，實力不足並不構成更改立國目標的理由，這就像政府近年推動人權立國的理念，並不代表政府已經具備有實力處理所有人權議題，或福利國的理念也不必然建立在已經有效達成全民福利的成就上，這其間，是一樣的道理。即使反攻大陸在現實裡是達不到的目標，但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，可以保證軍民一心，國軍有明確的敵我意識，人民有為復興基地奉獻的決心，如此國家的建設可以一步步開展，從與中共的競爭敵對中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簡言之，漢賊不兩立的國策是要維繫憂患意識，以免國家死於安樂。

漢賊不兩立的道理並非敵來我退，但若是不退，其目的是繼續作戰，將之驅走，而不是謀求持久的雙重承認。只要雙重承認的政策一出，立刻就動搖軍民奮鬥的基礎，因為既然不反攻大陸了，那麼與大陸的交往關係就自然也必須放鬆，雙方

¹² 周玉蔻，〈漢賊不兩立已成過去式？彈性回應重新起步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7年11月13日）2版。

表面的敵意消散，國軍失去作戰目標，日益弛怠，遲早會被解放軍一舉攻破。其實不待解放軍來攻，內部也會有為何而戰的困惑出現。假如中共放棄統一便也無妨，然而中共顯然未往放棄方向發展的跡象，反而加緊宣傳統一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國家目標。

當行政院有官員提出雙重承認的概念後，沈昌煥在中常會發言，藉著陸工會主任蕭昌樂報告中共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分析的場合，詢問陸工會有沒有研究中共對雙重承認概念的反應，他同時提到李總統要求中共宣布不以武力犯臺，以及民間所謂經濟反攻與文化反攻，將「對海峽兩岸未來關係產生重大影響」，但是執政黨對這方面的研究始終跟不上。¹³ 沈昌煥認為這正是立場鬆動之後，政府只能跟在民間後面的結果。他對於陸工會不再把中共看成敵人的報告語氣，感到甚為不解。

蕭昌樂之後一次在報告中共五中全會有關分析時，受到沈昌煥嚴詞指責，不但他聽起來像是會議公報，更重要的兩點是，沒有分析五中全會對復興基地有何利害關係，或對我方的統戰策略有無調整，也沒有分析會議的可能影響多深遠。一言以蔽之，沈昌煥指陸工會「不該太過客觀」。¹⁴ 客觀兩字道出了沈昌煥敏感之所在，因為客觀的態度是一種在政治上事不關己的反應，所以隱含的是一種政治主張，使得復興基地從與中共殊死搏鬥的立場，變成一個外在客觀者的角色。沈昌煥在評論國統綱領的時候，也是同一個態度，即認為綱領內容「對大陸同胞的關愛似乎不夠」。

¹⁵

沈昌煥分析指出，恐怕客觀就會讓人覺得是放棄立場。他質疑大陸政策是「無政策也無共識」。他的解決之道正是從漢賊不兩立出發，首先是要自己有實力，如此就不必在乎中共的反應；其次要從黨內、政府內、輿論界形成共識，推展到民間；再其次，對於已經形成的共識要擇善固執，堅定不移；最後是不能浪漫，所以對中共不能限於憧憬而掉入陷阱，對國際間也不要迷信其保護。¹⁶ 簡言之，就是「一定要

¹³ 〈專案研究中共統戰新動向 政府將整訂新的大陸政策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7年4月22日）1版。

¹⁴ 張昆山，〈大陸工作會分析中共五中全會變局 沈昌煥嚴責蕭昌樂報告欠充實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8年11月16日）2版。

¹⁵ 陳世耀，黃玉振，〈爭辯國統綱領 執政黨中常會險些「走調」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0年3月7日）2版。

¹⁶ 黃玉振，〈執政黨中常會聽取黃昆輝報告建議大陸政策應有民意共識 避免掉入中共陷阱〉，

自立自強」，一直到辜汪會談前夕，他還力促深入瞭解中共，警告國人對中共威脅的低估，不過仍有信心「共產主義必定會在大陸失敗」。¹⁷

辜汪會談無疑是正是終止三不政策，替漢賊不兩立的國策劃下了句點之作。沈昌煥對這個發展瞭然於胸，但並不表示他也接受這個方向是正確的。在十四大之前不久一次中常會，他承認「他過去反對兩岸談判，但現在是和解代替對抗，而過去我們堅決反共八股宣傳，現在也不要說了，多說就不能談了」。¹⁸沒有了復興基地，沈昌煥曾經效力的國策，如今當然也就不是為著同一國了。

（二）尊蔣

沈昌煥第二個關鍵的立場是尊蔣，這同時包括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。尊蔣有個人的因素，蓋沈自青年時期起即獲器重，委以大任，對蔣介石備極尊重愛戴，他與蔣經國的關係益佳，兩對夫婦有時同慶結婚紀念日。蔣經國與李光耀之間關係的建立，沈昌煥出力甚多。另外，各界也經常邀情沈昌煥講述蔣公行誼。他自己待人處事的原則，與他形容蔣介石時如出一轍，他說蔣公一生嚴以律己，虔誠奉行基督精神，知行合一。不過，尊蔣遠遠超過了個人層次，這從沈昌煥形容「蔣公最了不起的是切實把握住中國文化的精神命脈」的字裡行間，透露了出來。¹⁹

復興基地論述中極關鍵的一個方面，就是復興中華文化，這是在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際，蔣介石特別提出來的任務，當然也是鑒於軍事反攻實力不足，國際形勢漸變的緣故。爾後歷任總統均兼任文化復興總會的會長。沈昌煥在1992年特別點出蔣介石與文化命脈的聯繫，自然是在維繫蔣所承接的中華民國正統，基於這個正統，才有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，尊蔣與復興是一體的兩面。

蔣經國並非如同他父親般自始傳承中華民國的道統，但沈昌煥特別讓國人注意到，經國「潛心攻讀經典著作，涵泳中華文化」，所以能夠「融會貫通中西文化」，不僅「俄文造詣，極為高深」，而且「國學功力，亦極深厚」，以至於成為「對馬列主義和中共認識最深刻的專家」，乃是「領導國人走上光復大陸勝利之路」的「巨大

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7月23日）3版。

¹⁷ 張輝銜，〈邱進益訂七日前往北京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2年4月1日）3版。

¹⁸ 黃玉振，〈辜振甫中常會報告辜汪會談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2年5月6日）3版。

¹⁹ 莊佩玲，〈紀念蔣公 婦聯會禮拜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0月31日）6版。

保證」與「時代巨人」：²⁰

當時包括若干學人在內，都還迷惑在民國三十八年毛澤東所唱「人民民主專政」的符咒裡，根本弄不清楚什麼是「無產階級專政」。經國先生是馬列學說專家，也是在臺灣揭穿「無產階級專政」謊言的第一人。其後多虧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，從學理上作最清晰的闡釋。

蔣公是反共先知，經國先生則把馬列共產主義的學術假象，予以徹底批駁拆穿，使世人瞭解共產主義的破產滅亡，為歷史的必然。在經國先生領導下，我們喊出「共產主義破產」的鐵則，已逾二十年。這決不是宣傳口號，而是基於理智良知，基於學術識見。經國先生逝世前，共產世界已經發生嚴重信心危機。經國先生逝世一週年以後，大陸即掀起震驚世界的民主運動。雖然不幸以「六四」殘酷屠殺告終，但東歐共產政權的爭先崩潰，正是大陸中共政權面臨崩潰的外延，也是經國先生卓識的驗證。追本溯源，是由於共產主義的徹底破產。²¹

因此，經國對復興基地的意義卻不稍減於父親，沈昌煥如此追述他的行誼：

1. 38年10月金門古寧頭之戰，他是最早到達戰地的一位；
2. 44年2月大陳撤退，他是最後離開大陳的極少數人之一；
3. 45年元月開始，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勘探，他攀山越嶺，先後徒步勘探四次之多；
4. 47年8月23日起的46天冗長砲戰日子裡，他冒著熾烈砲火，走遍金門戰地，成為進出金門最頻繁的一人。他的鎮定勇敢，使當時司令官胡璉將軍讚嘆，從他身上領會到，什麼叫「從容乎戰場之上」的最高修養。²²

尊蔣與沈昌煥對中國統一的態度有著哲學上的聯繫，他在推介蔣介石的一生時，特別講述「行仁」的道理，認為行仁是蔣介石當年得以以黃埔孤軍完成北伐，「面對百倍、千倍之強的敵人，而無所畏懼」，從而「能把中華民族的道統遞嬗而不墜」。沈昌煥認為這種仁者無敵的氣概，使蔣介石足以統一中國，領導抗戰，「讓中華文化的青天白日，燭照中國大地」，足供缺乏「仁」的精神的日本武士道所警惕。

²⁰ 沈昌煥，〈仰之彌高，歷久彌新〉，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紀念會（民國80年1月13日）。

²¹ 同前註。

²² 〈時代巨人仰之彌高 追思經國先生 中樞昨集會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0年1月14日）：5。

同理，蔣介石提出「亡共在共」的「高瞻遠矚」，就是對於共產暴政否定中華文化而來，而這竟也成為復興基地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，沈昌煥在推崇蔣介石一生的同時，特別警告復興中華文化是唯一的生路：

我們今天的社會，許多人都感到亂，不如以前那樣有序。霸道的作風，奢靡的生活，混亂的思想，甚至有人否定中華文化，否定自己是中國人，幻想由外國人來保障我們的自由安全使人擔憂恐將造成重大的災難。要糾正目前社會反常的現象，以避免發生不可收拾的危機，唯有全國上下徹底覺悟，由重振中華文化做起，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條生路。²³

蔣介石與蔣經國將臺灣當成復興基地在建設，凡有利於軍事國防、證實三民主義優越性者，都是施政之重點。沈昌煥的尊蔣固然表現個人的忠貞氣節，但不可忽視尊蔣在鞏固復興基地敵我意識，團結軍民一至對抗中共方面的積極意義。兩蔣在任內都是堅定的反共者，也都以中國統一為國家的目標，既然中華民國的存亡繫於光復大陸的志業，則兩蔣的傳承理當不能中斷。

（三）民主化

保守主義者重視的是價值，自由主義者則注意現實的變化，沈昌煥對於臺灣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本身，並沒有具體的評論，也不曾有負面的意見，他所重視的，是中國國民黨作為執政黨，在民主化過程中要如何因應的問題。他所反對的，乃是在民主化變遷中出現的許多看法，固然這些看法與他所堅持的立場相衝突，但他批評的重點鮮少指向民主化，而更多是對執政黨缺乏精神，以至於無法順應民意，或有力地對民進黨的宣傳進行駁斥。換言之，保守政治家之保守，是其以價值或理念為核心，不是以延遲或反對民主程序為內容。

政治上的對立如果是以程序為鬥爭焦點的話，勢必對立的各方都要宣稱改革站在自己這邊，並指責對手，或是破壞、阻撓民主程序的運作，或是假借程序之名阻撓改革。這樣的鬥爭由於缺乏實質的價值內涵，難免流於政治動員，這也就是自由主義精神隕落的開始，一旦政治派系分合取代了理念與現實的辯論，政治便會淪為空洞的權力之爭或利益交換。沈昌煥在本土化與民主化初期執著於實質問題的批

²³ 沈昌煥，〈先總統 蔣公持躬治事的追憶〉，發表於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蔣公誕辰紀念禮拜集會（民國81年10月30日），頁10-11。

判，是保守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。

沈昌煥任職中常委的最後四年當中，一共遇到兩次國會大選。第一次是在1989年底，第二次是在1992年底，這兩次大選，國民黨都表現不佳，尤其是第二次，執政黨內部派系林立，新國民黨連線與集思會相互傾軋，前者在1993年趁選舉勝利而脫離國民黨，組成新黨。依照國民黨自己的檢討，敗選的原因往往歸於對手不正當的宣傳手段，這與沈昌煥的要求大相逕庭，他相信執政黨本身要在理念上自我檢討，而不是怪罪民主化過程中社會的不適應或反對黨的不守法。

在1989年的選舉失敗後，沈昌煥要求黨內檢討為何自己失去民意支持，對他而言，黨精神的淪喪必須要透過改造，因此在中常會上以民國38年底的改造為模範，要求痛切檢討，恢復黨的傳統精神。²⁴ 38年國民黨敗退臺灣，組成改造委員會，就黨的組織、前途、時局與目標定期聚會，熱烈討論，成員相繼擔任之後三十餘年的政府領導，並沒有想靠著怪罪中共就將責任交代過去。他將民主化時期民進黨的挑戰假想成內戰的失敗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豐富意義的比喻，可見他不但不曾抗拒民主化，反而是要積極迎戰民進黨。

沈昌煥於是提到黨的精神，指出黨在榮星案、蕭天讚案及股市管理上都表現軟弱，當然會失去民意。另一方面，他敦促黨要在一個中國及反共的基本國策上，一定要立場堅定，黨內必須痛切反省，因應時變，才能恢復傳統精神。²⁵ 1992年選後中常會上，他因為黨對於輔選失利所作的報告是「沒有良知的報告」，批評相關人士不敢負責，表現「無恥」，大家都只會「爭權、爭錢、爭位子，每日奔波鑽營，令人覺得寒心」。²⁶

換言之，黨在民主化的壓力之下敗退，其問題不是出在民主化，而是出在黨，什麼樣的黨會勝利的問題，佔據了沈昌煥的注意力，因此他認為黨必須反躬自省，反求諸己。然而，多數觀察家在反對保守主義時，只注意到保守政治家對現象的批評，沒有區分他們所批評的，到底是民主化，還是黨失去競爭力，因此將保守政治家歸為反對改革，這恰恰與沈昌煥主張改造的立場相反。改造是一種精神運動，與

²⁴ 寇維勇，〈選舉挫敗後第一次集會，中常委連番抨擊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8年12月7日）2版。

²⁵ 同註24。

²⁶ 蕭維文，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許水德接任秘書長 五中常委嚴詞批判黨務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2年3月11日）3版。

以改革為旗號的人取向不同，後者以除去意見或派系上的異議者，來重整黨內權力結構。故保守主義政治思維指向內在的自省，而當時的改革者則指向人事的更迭，與世代的交替。

保守政治家在面對民間媒體為民進黨助長聲勢的時候，其態度是希望黨能出面應戰，而不是阻撓報導。國是會議期間，臺獨領袖的各項主張都在報章詳盡報導，沈昌煥眼見國民黨的聲望和影響大受影響，因此認為「有必要予以導正」，其中包括對民進黨大憲章與彭明敏返國事件。²⁷他的批評立刻引起媒體的反擊，認為「新聞報導的一大功能，是容納不同意見，服務民主社會」。上述事件「本就是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」，如果「淡化報導」的話，「恐不是考慮新聞價值，而是考慮立場政策」。²⁸

這樣的反擊並不少見，但基本上反映了對保守政治的誤解。不准報導或介入新聞報導，以免自己黨的聲望受創的作法，並非保守主義所堅持的態度。李登輝在聽取中常委意見後，鼓勵多訂黨報的作法，²⁹更不屬於保守主義下的適當範疇。沈昌煥在面對臺獨宣傳時的對策，是澄清執政黨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，有了立場後，人民就不會聽信臺獨主張的大量報導，倘若沒有立場，即使人民只聽到一次臺獨，甚至沒有聽到，也都會動搖，因此真正的重點是執政黨自己的方向有沒有迷失、動搖，而不是要不要介入主導新聞。

沈昌煥的態度在十四全之前的一次中常會上，表現的淋漓盡致，說明保守主義者關心的是立場、價值、理念，而不是程序的操弄。十四全前夕，執政黨文工會的文宣總訴求，其主題為「民主、民富、民安」、「法治、公平、正義」，沈昌煥批評之為軟弱無力，主張十四全的主題「一定要掌握時機，格局要大」，並以民進黨推出的縣市長選舉文宣為對象指出：

民進黨要以「團結的民進黨」對抗「分裂的國民黨」，要以「清廉的民進黨」對抗「歪哥的國民黨」；但是面對民進黨的攻擊，國民黨的文宣卻沒有特色，也無力反擊，尤其是十四全的主訴求，在任何時候、任何民主國家都可以使用，這種訴求軟弱無力，沒有把十四全的重要性突顯出來。³⁰

²⁷ 陳世耀，〈濫用新聞自由報導偏頗？〉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9年6月14日）2版。

²⁸ 韓尚平，〈民主啟示錄／民主篇 新聞媒體不是一言堂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9年6月15日）27版。

²⁹ 同註27。

³⁰ 黃玉振，「國民黨十四全的「口號」放諸四海而皆準 文宣 軟弱無力 政綱 冗長空洞」，《聯合

然而，觀察家重視的卻是，與民進黨立場迥然不同的國民黨官員會不會去職的問題，以改革者自居的李登輝也以為保守政治家關心的是職位，因而特別召見他們，澄清自己沒有推動世代交替的意圖。³¹相形之下，沈昌煥關心的是，國民黨的領導被人形容是威權政黨，³²他寧願花精力去辯論歷史定位的問題，而非職位的去留。

三、沈昌煥的政策論述

沈昌煥在李登輝就職之後，到他自己退休之前所參與的八次政策辯論，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前述的三項基本立場，這八次政策辯論包括胡秋原開除黨籍案、赴蘇聯工商考察案、國是會議籌備案、蒙藏委員會存廢案、陳哲男案、臺獨黨綱案、大陸院士來臺案與修憲案，向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胡秋原案

李總統就任之後，沈昌煥發揮保守思想的第一個案子，是資深黨員胡秋原赴大陸探親並與中共統戰部長與政協主席會面。原本考紀委員會考慮以兩年停止黨權處分，沈昌煥認為不可如此從輕懲處。雖然赴大陸探親是蔣經國的政策，但具有國民黨立法委員身份的胡秋原，則屬於三不政策禁止之列，畢竟國共勢不兩立的復興基地論述，乃是國家命脈所繫，縱容胡秋原的結果會是，中華民國將無所取信於人民，於世界：

……各方也知道常會將討論本案，如中央考慮結果，從輕給予兩年黨權處分，社會一般老百姓將如何想法，對國民黨處理此非常嚴重的事情，在我們反共基本立場與中共不妥協立場如何交代。剛才有人提到發表一嚴正聲明，這聲明一定非常嚴正，是談堅決反共政策不變，經國先生生前講過，我們堅決反共政策不變，光復大陸目標不變，鞏固復興基地的努力不變……。我們有如此堅定的立場，一個資深的同志，有五十年以上黨齡歷史，更不應該傷害黨，不能因為是資深同志就有特權，就可傷害黨，違反根本政策，要採取行動，與要減

報》（民國82年6月17日）4版。

³¹ 黃玉振，「接見邱創煥等私中常委時 總統表示 未曾言世代交替」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2年2月13日）3版。

³² 徐履冰，「宋楚瑜談訪美：民主革新必受尊重」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8月27日）4版。

「亡我們的人一起吃飯，如何交待？」³³

沈昌煥擔心的情形已經在發生，《民眾日報》將胡秋原與二位主張臺獨判重刑的人相比，讓沈昌煥覺得一定要開除胡秋原黨籍，才能杜悠悠之口。何況，被僅僅停止黨權的人，返國之後可以聲明脫黨，說大陸比臺灣好，若未開除，屆時如何處理？也有人擔心胡秋原經營的雜誌會反對國民黨，沈昌煥認為，「如有這樣的考慮，更不成其為革命黨了」。最後這一點，可說是保守主義最高風亮節的註腳，表示人數多少，實力大小的問題，都比不上立場堅定來得重要，因為他覺得蔣經國去世後至今一年多，是「黨遭受到最危險的時期」。

胡秋原案涉三不政策，輕罰予人國共要談的懷疑，接著就會問派誰，是不是胡秋原就是談判代表，如果這樣，政府還有什麼立場領導：

……現在等在那裡要排隊去，不過是送禮，可以得風氣之先，所以對胡秋原的事沒有明斷處理辦法，以後別的黨員也會去，去那裡幾個星期作秀，鋒頭很健，最多只停止黨權兩年，並無關係。所以黨必須處分，並由文宣單位做充分配合，說明中國國民黨的決定是對的，違反黨紀與國家政策，黨給予處分對人民有所交待。³⁴

（二）工商考察團訪問蘇聯案

沈昌煥最後幾年任期中處理最具爆炸性的案子，就是民國88年臺灣各界組織工商業考察團赴蘇俄一事。考察團中有政府官員參與，但是決策過程隱晦，既不知行政院會及相關部會之中有誰參與，也沒有在中常會中慎重討論，就已經突然成行。這個案子涉及兩件事：一是對於蘇俄的反對態度有無發生變化，事關國家的反共立場，也就影響到大陸政策；二是黨內決策精神遭到破壞，責任倫理喪失；二者都是保守政治家維繫理念與團結的關懷所在，因此引起沈昌煥嚴肅的批評，涉及到反共、漢賊、尊蔣與復興等方方面面：

……因為蘇俄的所作所為——赤化中國，就在消滅中國國民黨，消滅國民政府。在本黨改造時期，改造委員會有一兩位同志曾經提到，今天共匪要血洗臺灣，蘇俄與共匪不和，我們可否聯蘇以制共匪。總裁聽了這話，覺得太離奇

³³ 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（民國77年9月21日）。

³⁴ 同註33。

了，國民黨負責同志中有此想法，所以在民國45年12月出版了「蘇俄在中國」一書，我不知在座同志有多少人看過這本書，蘇俄與我們的關係，不是要我們的命，我們的命已經被他拿去，這對國際上，對我們的國民又如何解釋？³⁵

外交人員在國外勸阻別國不要為利益與中共往來，如果自己為了利益與蘇俄往來，一方面還繼續說「共產黨是靠不住的」，友邦會說：

你們的政策動搖了，老兄，你跟蘇俄解凍了，從前蘇俄要滅掉你們，是你的世仇，現在卻與之往來，中國對我們沒有害處，為什麼不能來往，請問連部長你的駐外人員，或外國友人的訪問團，問到這個問題，你將如何答覆人家……？他們會問外交部，要問駐外代表……這與國防大有關係，不但今天有關係，將來也有關係，將來回大陸，蘇俄還是我們的假想敵人。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，最後伸出手來阻擋我們的是誰，也要想一想……³⁶

沈昌煥強調「蘇俄在中國這本書至今仍有價值，不能一提到總裁就覺得是思想落伍，革命實踐院可以不讀別的書，這本書卻還是要讀」。他認為沒有讀過這本書，不配談對蘇貿易。³⁷這樣的看法引起國會議員與媒體批判，³⁸或謂抗日時期亦曾接受蘇聯援助，不能作繭自縛於某一意識型態，何況「漢賊不兩立」的成績單有目共睹，故沈昌煥對中華民國外交史須負「相當重大的責任」，他的「年齡老」或「資格老」與人格成熟「不相干」。³⁹

這樣的人身攻擊與沈昌煥對待同志的態度南轅北轍，因為沈昌煥認為在黨內的同志血脈相連為一體，親愛精誠來表示愛心，若碰到國家有危險卻不說就是失職，但這是「就事論事，不是對那個人」。他特別提到應負責任的連戰與陳履安，是他在改造委員會同仁連震東與陳誠的子嗣，只會照顧他們而不可能害他們。他的重點是，知道錯了就要改，而不是閃躲，任何同志有問題，其他人是「榮譽與共」、「生死與共」的，寧願在中常會攤開來講，對「每一位同志只有支持、幫忙」，絕不是要

³⁵ 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記錄（民國77年10月12日）。

³⁶ 同註35。

³⁷ 同註35。

³⁸ 「政經糾結自我設限」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7年10月16日）2版。

³⁹ 龔濟，〈這不行，那不行，什麼行？——沈昌煥先生在國民黨中常會的震怒使海外人士費解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7年10月16日）2版。

檢討某人或檢舉某人，更不可能要取代某人的位置，或有惡意。

沈昌煥承認他之所以發言激動，在於問題太重要，不能支吾其詞，一定要明確黨的對俄政策有無改變，而且黨內對這種重大決策務必經過討論，外界必然以為是黨中央已經有此決定，如果真的要作，大家就應該有個決定，「以全黨力量來支持這件事」，並且「要突破要進取，要開展要開放，做驚天動地的事情，才表示我們有魄力」。但假如覺得有害處，就應該交代清楚整個決策過程，「減少以後的錯誤」，絕「不能文過飾非」，不能因為私交而模糊對國家的責任。⁴⁰

如前所述，對蘇外交是一個國策層次的問題，不是外交戰術的彈性問題，稍一不慎，臺灣便失去反共與復興的號召，就等於在內戰中做出最後的臣服，而中共也不會因為臺灣有彈性就放棄兼併。九〇年代以降臺灣在外交戰場上節節失利，並未因為主張雙重彈性就旋轉乾坤，就說明沈昌煥的保守立場有其作用，他因而算是李登輝所除去的第一個對象，也是臺灣最後一個保守政治家。在上述中常會結束一週，李登輝接受了沈昌煥的辭職，國民黨的反共立場從此日益模糊。

沈昌煥去職的導火線無疑正是赴蘇考察一案，他在中常會上逼問決策過程勢必造成李登輝的尷尬，而他去職之後本案也不了了之。一般人遇到這種事，難免心存不平，但是沈昌煥退職後，完全沒有對任何人有一絲抱怨，也沒揭露任何秘辛，正是他自己強調黨員之間必須團結的最高表現。這種理念導向的保守固執，在政策辯論過程中值得保留，使改革論述能得到嚴正的檢視。沈昌煥去職無異於反共立場的全面退卻，以致政府中的改革者沒有具體理念造成的保守為對象，也沒有同志應當上下一體的認識。於是，政策辯論式微，人事鬥爭與群眾動員成為僅存的統治手段，果其然，沈昌煥去職同時，媒體傳出不是因本案退職的分析，甚至釋放李登輝其實授權他在中常會發言的消息，⁴¹以隱藏李登輝對沈昌煥的鬥爭。

（三）國是會議籌備

民國80年夏召開的國是會議，延請了大量海外異議人士，討論各種原本在政治上是禁忌的話題，透過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、分析、訪談，帶來政治上一片革新的

⁴⁰ 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記錄（民國77年10月12日）。

⁴¹ 戒撫天，〈時髦蘇聯熱 步調要放緩 當局基於兩項考慮決採穩重態度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7年10月13日）2版。

氣氛。對國民黨既有反共復國與復興基地的世界觀，社會上充滿了要加以拋棄的氛圍。保守政治家則能繼續堅持立場，並且要求黨內同志，在面臨動盪危機的時刻中，彼此之間必須先對關鍵問題有共識之後，才能再出去與民進黨與海外臺獨溝通辯論，否則，黨內同志彼此間就不能真誠合作，一旦遇到國是會議中有人挑戰，很快就會造成黨內四分五裂。保守主義者豈會不知，國是會議的政治功能恰恰是在動搖國民黨的政治論述，故當保守政治家還在觀點上琢磨拿捏之際，改革派的目的則是透過改革程序來迴避共識，從而否定任何一貫立場的神聖性或正當性。沈昌煥評論到：

……我們同志間並無共識，因為常會從來沒有討論過。這許多根本問題，如體制問題、大陸政策問題，要提高警覺，有好的辦法處理。要開好國是會議，不管如何籌備，首先黨的同志要有整合團結共識，更革新，更進步，更民主，才能對此艱難時刻，求得會議的成功。⁴²

於是沈昌煥希望國是會議的召開不能太倉促，相反的，還應維持高度警覺，因為一方面有臺獨勢力主張建立新國家，另外一方面又有學界與商界倡言政經分離，⁴³都對反共復國的國策形成挑戰，倘若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，無異是幫助堅定統一中國的中共來兼併臺灣。沈昌煥擔心國是會議讓大家陷在某些短程的目標中，以致於混淆了長程目標。保守政治家謹守儒家格言，相信若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故不能把國是會議想成「萬能良策」，歷史上這類會議不僅沒有成功，且引出許多困難。⁴⁴他因此間接卻具體地揭穿黨內有心人的謀略。

……會議討論主題不能被動，不能將民進黨各項高調的主張納入，我們是要在體制內改革，而有心人士則是要藉機推翻國民黨，提出所謂新國家、新體制、新憲法，如果我不接受，就要求公民投票；對中華民國、國歌、國旗不認同，對總統不尊敬。我們要有憂患意識，對許多問題都要有特別的警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對會場無法控制，短程目標不能恢復平靜，長程目標發生什麼結果不

⁴² 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記錄（民國79年3月21日）。

⁴³ 陳世耀，〈執政黨討論國是會議 多位中常委提出建言 整合黨內意見 加速憲政改革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9年7月12日）2版。

⁴⁴ 張昆山，〈研討憲政體制 政治革新 國家統一 國是會議 可能六月底前召開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79年3月22日）10版。

知道，這都是問題。⁴⁵

(四) 蒙藏委員會存廢案

保守政治家認為國家之存在，奠基在其政治立場上，立場動搖則國家危殆。如果將國家視為只是對特定疆土的掌握，不能說明國家的道德目的，則民心自然渙散，其所擁有的疆土，也就不能確保。用立場的清晰與堅定與否來檢視政府的政策，是在鞏固國家的根本，不是在阻撓國家的進步。往往以改革為口號的政治勢力，在政治上另有圖謀，卻能隱藏在某種關於程序正義主張的背後，唯有透過保守主義的價值檢視，才能還原隱藏起來的政治主張，從而評估一項關於改革的提案，對國家生存有何影響，蒙藏委員會的存廢即為一例。

國是會議籌備期間，民進黨與各界紛紛有人提出取消蒙藏委員會的建議。在第二階段修憲過程中，又有人主張承認外蒙古，甚至行政院高層也主動開會諮詢各界意見。對沈昌煥來說，外蒙問題並非簡單的領土變更，或將一個看似已然獨立的國家劃出範圍而已，因為外蒙乃中華民國固有疆土，倘若可以依照現狀就調整憲法，那麼「西藏與臺灣都可能獨立，中國將因而分裂」。⁴⁶ 這個保守的立場一方面是在重申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，從而抵抗臺獨，另一方面更是揭穿外蒙問題上的改革主張出自臺獨，並非只是務實的調整而已。

從蒙藏委員會存廢的問題著手者，在保守主義的檢視下，其性質一樣，都是「有計劃來拔掉」中華民國的根。表面上反對黨只是在討論預算的刪減，而黨內同志卻有人對蒙藏問題的內涵不了解，因此看不清反對黨的動機，是把臺灣「與大陸劃清界限」，故政府「應提高警覺，堅定立場，有決心保持這個立場」：

……蒙古與我中華民國有五千年的歷史，中國歷代專制王朝，元朝對中華民族也有九十年的統治，在歷史上不能把蒙古劃除。從歷史上講，西藏土地佔中國總面積很大的比例，英國人、俄國人都處心積慮心存掌握西藏，英國甚至透過印度對西藏、尼泊爾不斷滲透顛覆。如西藏被英國、俄國影響或控制，我們回到大陸，以中國政府言，雖讓西藏自足自治，但與中國關係不能分開。若

⁴⁵ 同註44。

⁴⁶ 黃玉振，〈吳化鵬在執政黨中常會中報告 外蒙工作敏感 文件收回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4月16日）4版。

西藏與英國、印度、俄國等關係反較我們更密切，這在戰略安全上便有重大問題。蒙古亦復如此，蒙藏委員會在行政上所佔預算不大，如認為蒙藏事務與之無直接關係而予取消，不但影響蒙藏人士對中華民國的看法，認為蒙藏已自中國大陸完全割掉，而劃清界限。⁴⁷

（五）陳哲男開除黨籍案

沈昌煥在中常會的最後歲月遭逢的重大挑戰，是立法院的國民黨次級團體「集思會」成員陳哲男的開除黨籍案。陳哲男是國民黨推出的立法委員候選人，在競選期間主張「一中一臺」，引起黨內保守政治家的批評，陳哲男接著又發表對黨內賣臺集團的攻訐：

……臺灣確實有賣臺集團，它的首領是郝柏村；第二位是沈昌煥，他過去對臺灣人說漢賊不兩立，現在專門拿中共恐嚇臺灣；第三位是李煥，他是世界出名的發明家，臺灣選舉買票是他發明的，他的副手是關中；第四位是許歷農。⁴⁸

陳哲男的一中一臺言論，使他有受到被開除黨籍的危機，引發黨內對中共武力犯臺的討論，從而有了他對賣臺四奸的反擊，他們所屬的集思會，在賣臺四奸論發表後，立刻隨著聲援之，謂「反對許歷農、沈昌煥、李煥假中共恫嚇臺灣兩千萬同胞，影響社會安定」。⁴⁹沈昌煥告訴同志，不能忍受奸細的指控，因他有55年的黨齡，「多年忠於國家」，與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且「父母的墳都被中共毀了」，就是「殺了我，我還是反共」，所以若不開除陳哲男，「那開除我的黨籍好了。」⁵⁰

針對陳哲男的臺獨主張，沈昌煥反駁說，漢賊不兩立是執政黨的主張，「因為這主張，我們今天還存在」，他特別強調的是，「我們就是想漢賊兩立，中共也不會

⁴⁷ 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八十六次會議記錄（民國79年4月25日）。

⁴⁸ 徐履冰，〈陳哲男違反黨紀案 考紀會提案內容「競選訴求極盡挑撥詆毀 破壞團結」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2月3日）2版。

⁴⁹ 徐履冰，〈陳哲男言論引發爭議 考紀會「蒐證」備用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1月24日）5版。

⁵⁰ 徐履冰，〈提振軍紀 吳王同意斬愛妃 整肅黨紀 主席通過開除案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2月3日）2版。

同意」。⁵¹ 陳哲男發表一中一臺之後不久，中共政協主席李瑞環一次警告性談話在各大報批露，聲稱中共為制止臺獨不惜中止經濟發展，即使犧牲流血，前仆後繼也在所不惜。沈昌煥在中常會上手持這份報告，證明臺獨對臺灣的危害，他認為在當前面對中共的威脅下，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團結，批評一中一臺的主張就是「臺獨的包裝」，他希望作為執政黨應該嚴懲一中一臺案，如此才不會「授中共侵臺的口實」。⁵²

沈昌煥是不是在用中共嚇臺灣，他下判斷的關鍵在於，中共是否能忍受臺灣獨立？以及臺灣如果不獨立中共是否就會放棄兼併臺灣？主張臺獨的人自然傾向於相信，中共不敢或無力進犯臺灣，故與沈昌煥的判斷不同。尤其重要的是第二個問題，亦即沈昌煥相信臺灣即使不推動臺獨，中共仍要兼併臺灣。所以消極不獨立是不夠的，還要推翻中共政權才有寧日。至於推動臺獨，當然就更不可能達成與中共共處的結局。換言之，沈昌煥對中共的態度除了不輕敵外，還有不畏懼。這與主張臺獨的人期盼中共不敢犯臺的態度，迥然不同，臺獨對中共的態度只是不擔心，而且在不擔心的背後，多少帶有一點僥倖的心理，相形之下，沈昌煥勇於表達與中共對抗之志氣，實在難謂用中共嚇臺灣。

為了嚴正視聽，沈昌煥在草擬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共同主張時，建議加上國民黨「是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」的文字修正，獲得採納。⁵³ 沈昌煥又偕同倪文亞、高育仁、徐立德、華力進、祝基澄等人，代表中常會政治小組草擬對一個中國涵義的嚴正聲明，在正式通過開除陳哲男之前一週，先以此一書面文件對一中一臺的主張嚴加駁斥：

……在統一的目標還未達成前，在中華民國臺灣生活的兩千萬同胞，不管何時來臺灣，不管來自何處，從歷史上、地理上、民族上均是一個中國，大家均在這個生命共同體內，要共同努力，要先把臺灣建立好，不斷提升國力，發展務實外交，使外交空間更為開闊……。在統一之前我們主張的「一個中國」是中華民國，不要掉入中共「一國兩制」的陷阱，使務實外交無法開展，並成

⁵¹ 同註50。

⁵² 政治組記者，〈執政黨中常會發言一面倒 一中一臺黨紀處分 李主席僅採煞車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1月12日）3版。

⁵³ 黃玉振，〈執政黨中常會昨通過立委選舉共同主張 堅持「一個中國」反對「一中一臺」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0月29日）2版。

為中共製造對臺妄動的藉口。⁵⁴

（六）大陸院士來臺案

沈昌煥民國80年7月3日，獲聘續任國民黨黨內大陸政策決策機構「大陸工作指導小組成員」，當時新聞界頗感意外，傳說紛紛，咸信是因為他的外交與大陸工作經驗豐富。⁵⁵其中他明確參與共同決策的一個案子，是身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受邀返臺開會，是否應當邀彼等參與投票的問題。理論上，院士既然來開會，沒有理由不允許投票，但似乎將會造成雙方的官方接觸，不符合三不政策。好在四名大陸學者已表明不便接受院士的身份，因此自然解除了危機。其實，依照當時臺北高層的想法，未必不是想藉此機會形成對等政治實體的兩岸定位，所以也不會對大陸院士投票與否的問題擔心，真正擔心的人是陸指組當中持漢賊不兩立主張的成員。

陸指組後來熱烈討論，並作出決議，認為此案並非中研院個案，未來如招商局或商務印書館均有大陸股東，也會發生來臺開會如何規範的問題。而此次若真有大陸院士與會，勢「難杜社會悠悠之口」。陸指會建議，今後宜以傑出科學家身份相邀，而不宜以院士身份相邀。⁵⁶這個建議並不符合要與大陸互為對等政治實體的政策，反而更符合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。

（七）臺獨黨綱案

民國80年10月，民進黨將所謂臺獨條款納入黨綱，引起外界關注，對於國民黨的可能反應紛紛猜測，社會各界也發表評論，有的主張政府採取嚴正立場依法辦理，也有的則主張政府不宜干預，應在選戰中決定臺灣問題。但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此案時，多數發言的人站在依法處理的看法上，亦即對於政黨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或擅改疆域的法律規定，依照執行。⁵⁷社會各界同情民主化的聲浪甚高，因此對國

⁵⁴ 黃玉振，〈執政黨「一個中國」涵義呼應國統會宣示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11月26日）1版。

⁵⁵ 黃玉振，「行政院長及府黨秘書長郝蔣宋共同擔任召集人 宋心濂 施啟揚 黃昆輝 三個人兼兩職 受注目 陸指組位階驟升 不再是橡皮圖章」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0年7月4日）3版。

⁵⁶ 黃玉振，〈未以中研院院士身分證就應視為大陸傑出科學家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7月1日）2版。

⁵⁷ 政治記者，〈如何處理臺獨黨綱 22人次言猶未盡「還有人想舉手」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0年10

民黨形成某種言論壓力。如果政府意在本土化與追求獨立主權，則由民進黨通過臺獨黨綱一案，反而是一種朝野的相互配合，由民進黨推動政府不便出面公開主張的政策。然而，這卻會對國民黨的立場造成影響。在沈昌煥的分析中，看到他與其他發言者不同之處，是他站在國民黨本身的立場之外，另外特別說明了為何要依法嚴辦的理由：

1. 中共與民眾都在看政府的處理方式，不能讓外界以為政府只對中共強硬，卻對民進黨特別軟弱。
2. 民進黨是在對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革命，既然是攤牌，不肯溝通，政府的立場一定要嚴正，才可能拉回民心，而不能主張以選舉來回應。
3. 選舉時要控制全面，不怕群眾運動，不能姑息養奸，也不能有法律假期。⁵⁸

基於這些理由，沈昌煥建議依法解散民進黨，雖可另外重組新黨，亦不容許主張分裂國土。換言之。他的立場仍是對事，不是對人，甚至預先想到民進黨人另組新黨，表示他並未慮及對民進黨人個別採取法律行動。他從未想要轉變民進黨人的立場，只想到中華民國的立場如何維護。

（八）修憲案

立場既然是保守主義最關心的，則立場出現轉變，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。在沈昌煥堅定的反共立場與漢賊不兩立的復興基地論述之下，李登輝往往不會選擇在實力成熟之前，對中華民國既有的自我定位挑戰，於是所表現出來的風格，就是對反對勢力的言論不採取反駁，或對於黨內共識不加以堅持，甚至避免黨內形成太明顯或強大的共識。凡是出現黨內有意見不一，就等於是對保守思想的挑戰，復利用反對黨的意見為奧援，作為社會民意流向的展現，如此形成改革的壓力。這個戰術的運用，往往造成保守主義失去辯論對象，卻驟然發現黨的立場已然動搖。

前述的臺獨黨綱案，與蘇聯工商考察團案均循此模式，在修憲案上也不例外。沈昌煥的出發點，是必須在過程上有所掌握，才能有效推動黨的立場，因此他主張

月17日) 3版。

⁵⁸ 同註57。

由國民大會一機關、一階段修完，如此靠著現行國大與黨的深厚淵源，動員他們支持黨的立場，修憲任務便可完善進行，也為之後改革打下基礎。⁵⁹相對於此，國民黨主導修憲的小組卻希望，先由現行國大解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，接著選出第二屆國大修憲，成為二階段，這在沈昌煥看來不能理解。

二機關二階段的作法，使黨能否完成既定目標的修憲失去控制，但是這正好是希望黨的立場能鬆動的一種戰術設計。果然在第二階段修憲時，原本的立場突然轉變，總統由委任國大代表選出的方案，被公民直選的方案取代，理由就是民意所趨。兩種方案相持之下，有人建議兩案並陳。當中常會討論這個問題時，其他中常委均就兩案優劣進行發言，唯有沈昌煥直指黨內主張發生變化乃是最大的傷害，他因此也反對兩案並陳，力主維持黨內既有立場：策劃小組這八、九個月來一直趨向委任直選，我非常驚訝，不解為什麼突然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。這對黨的能力是一種傷害，對黨的智慧與團結也有很大的傷害。在各方意見還很分歧之際，現在卻有一種聲音認為反對總統直選就是不民主……，李總統不是直選的總統？但是問李總統好不好，大家都說好。既然大家都已經擁護李總統了，為什麼還要再來選一下才合乎民意？⁶⁰

沈昌煥認為所謂兩案之中，只應該有一個案子提交三中全會，目的是讓天下定於一，否則將來一定有困難。但對李登輝而言，這個困難的發生，其實就是動搖保守立場的契機。

四、結論

自由主義的精神在於解放人們於束縛，順應社會與時代的變遷。這個束縛首先是觀念的桎梏，經由歷史文化的錘鍊而形成，但後來卻成為歷史進一步發展的限制。臺灣的自由主義論述似乎缺乏解放的精神，而更成為一種寬忍與開放的人生態度，由於沒有理念，就與鄉愿無異。因為當前臺灣已經沒有歷史文化錘鍊而成的政治理念，以至於對問題的看法分析，出於理念的少，出於一時考量的多。自由主義

⁵⁹ 黃玉振，〈「兩階段」修憲兼顧現行國大要求與回應民意期望——高層人士：屆時失控 民意如此也無可逃避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0年1月5日）2版。

⁶⁰ 徐履冰、宋自強，〈《紙上現場》臨時中常會 七個半小時直選VS. 委選 發言如拔河 許水德率先為直選造勢 陳履安發言李元簇發火〉，《聯合報》（民國81年3月10日）3版。

形成一種處理不同利益的過程價值，其本身已經不再是抗拒觀念桎梏的實質價值，因此便不能用來檢正各種利益主張的道德性，最多是勸人要相互尊重，對不同意見要包容，卻沒有什麼具體的道德立場。

自由主義從一種哲學立場，演變成一種溫和的處世態度之後，對於政治論述內涵隨之失去批判能力，只見社會上各種主張都在要求受到尊重，但不能對所主張的立場提出道德上的理由。自由主義對各說各話的言論現象失去規範的力量，不能不說是社會上已經沒有嚴謹忠誠的保守主義立場所致。即使社會上號稱改革的人層出不窮，自由主義者沒有能力分辨其間真偽，故即使偽改革論述充斥，藉改革之名遂行政治鬥爭之事歷歷在目，自由主義並無介入的有效角度。

保守主義的價值在於調節社會變遷的動力，為社會穩定提供一個論述上的基礎。所有主張既存秩序的立場，遲早都會要受挑戰，堅持一個特定理念也就淪為是既得利益的掩護，自由主義在揭穿保守主義虛偽性的戰場上，特別有爆炸性。有了自由主義的解放精神，保守主義的堅持才可以免於既得利益的把持，並有助於社會穩定的維繫。相反的，有了保守主義的堅持，自由主義的解放精神才有認真的對象，批判時才能真正落實到個人人性尊嚴的發揚。

沈昌煥離開政治舞臺後的臺灣，基本上陷入一個沒有保守主義的混亂狀態，他對政治爭議的看法總是令人如此熟悉，可以預期，沒有驚奇。然而在改革訴求之下，他的論辯鮮少引起對話，只會遭致沉默以對的態度，或無的放矢的人身攻擊。這種以人事鬥爭手段來摧毀保守政治家的風格，在臺灣的自由主義語境中反而還是可以接受的，因為另有所圖的人們拒絕同他對話，顯得他提出的政治立場似乎受到尊重，可是他們發動對他人身攻擊時，與自由主義者想要解放保守思想的努力一致，但另一方面卻溜進到自由主義者通常不會去論辯的政治鬥爭範圍中。自由主義者任憑保守政治家遭政客蹂躪，其實是自廢武功，拆除自己的批判舞臺。沒有沈昌煥之後所剩下的臺灣自由主義者，對於改革者的墮落不但無能為力，甚至還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御用。自由主義要復甦成為令人尊敬，且有內涵的哲學精神，必須把保守主義當成他們的復興基地。